

# 中韩文化交流的新成果

## ——评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徐 凯

八旗制度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为海内学术界所瞩目。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八旗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京营和驻防之分。对八旗制度从努尔哈赤时期产生、发展，到雍正帝胤禛改革八旗，加强皇权，学者们都作了较深入、细致的探讨，论著丰富，并且此项研究仍在继续。八旗驻防对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清史上占有明显地位。因驻防问题官修典籍所述未详，史料分散，此题专论鸿文，寥若晨星，专著更未见面世。可喜的是韩国汉阴大学任桂淳教授有志于此专题研究，条分缕析，积多年之功，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下简称《兴衰史》）一书，1993年3月，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付梓刊行。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补苴罅漏，功在士林。

任桂淳教授1967年毕业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史学科，后获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1975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硕士学位，1980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汉阴大学史学科。主要著述有《清八旗驻防之研究》（英文）、《清朝满族教育研究》（英文）、《清八旗驻防组织体系和财政情况小考》（韩文）等。任教授十余年从事清史研究，对八旗驻防用功最著，在《清八旗驻防之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兴衰史》一书。

全书凡四章，第一章，八旗军的兴起及其布防。考察了八旗兵在民族征服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及全国各地驻防配置。第二章，八旗制度的发展及其内部结构。追溯入关八旗系统的社会结构、组织形态和其演变过程。第三章，八旗驻防营制。叙述八旗驻防的布防过程、组织编制，及其变化、运行机制、管理体系和财政状况。第四章，八旗驻防的衰落。探讨了八旗驻防衰败的原由。三、四两章是全书的主体。书后附乾隆、光绪年间部分地区驻防分布、广州八旗兵配备，广州、荆州、福州、绥远官兵银钱领支等6个表，及福州、荆州、广州、成都、乍浦、江宁驻防图6幅。另附成都驻防士兵住宅、八旗官学旧址照片四帧。

通览全书，感到有以下几点特色：

1、解剖典型，广角度、多层次地探讨了八旗驻防制度。清入关后，满洲贵族在全国的统治日趋确立，八旗驻防地点不断增加变动。在诸多驻防地区中，作者选择了广州、杭州、荆州、福州和绥远五个点。这五个从南到北的驻防点，从清初至清末，八旗驻防历史久远，有连续性，另外他们都保存了驻防志等较完整的原始资料。用解剖“麻雀”方式，从政治、军事、财政、文化、生活等方面，对驻防制度进行全方位的透视，以点带面，对前人尚未论及的驻防营制、行政管理、财政收支等问题，提出己见。驻防建制规模大小是由驻防地的战略位置的轻重决定的，组织等级分明。作者指出，驻防初期，仍保持原有的八旗形式，驻防扩大后，组织上有两方面变化，一为佐领旗兵数目减少，一为出现新的官衔。驻防由临时变为永久后，将军、副都

统、城守尉相对固定，将军下设副参领、防御、骁骑校。康熙年间，各地驻防机构尚未整齐划一。广州驻防三千名汉军，由将军统领，下分左右两翼。乾隆时期，满洲八旗抵粤，将军下设满洲、汉军副都统各一人，分辖所属旗人，下属官吏相应调整。行政机构则以将军为首的总部为核心，将军的印务处，或会议府，每月将军、副都统等集会，商讨日常事务。总部下设左右二司，各由一名协领负责。每司又设三房，房与中央政府六部对应。乾隆初，驻防分设吏司、户司、礼司、兵司、刑司、工司，分隶左右二司。保证驻防地与中央政府信息畅通无阻。另外，在将军下置一个办理民事的理事同知，从雍正六年起各驻防重地均增设此官，专司有关争讼和逃兵事务及旗兵的粮饷配给、筹集制造火药和枪炮的工科。理事同知是“独立的民事官，直接受总督领导。”以上扼要的概述，作者将八旗驻防的军事、行政等管理体制爬梳得十分清楚，补上官书的阙略。

驻防财政问题是书中用笔墨较浓重的章节。作者依据驻防志和地方志等史料，排比勾沉，将驻防经济来源与开支状况同驻防制度的兴衰结合起来研究，颇得新意。驻防的经费先由中央政府户部作出预算，由驻防所在省政府负责支付，省又把粮饷数额分摊所属州县。如广东34个州县每年为广州驻防提供军粮86768石，闰年要多输3476石。湖北33个州县，每年向荆州驻防交纳114909石。此外，收交贡税分发旗军，酬劳驻防士兵主要分给他们房屋与土地，无地可分者则给予饷银给养。顺治初，直隶、山东、山西、江苏、陕西驻防旗员每人可以得到数量不等的无主土地。江南驻防地少人多，如广州、杭州、福州、荆州等地，仍依国库和省库供应。顺治后期，改用薪响制。雍正初，驻防旗人开始领取固定薪饷。将军以下官员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下发，士兵月月关饷。而薪饷数额凭官阶高下和家庭人口等而定。另供应旗兵蔬菜、劈柴、食盐等生活品。乾隆中，准许旗兵在驻地附近购买墓地，买不起者，葬入旗人专用墓地，丧葬费由驻防机构负担。清代中叶，国家经济窘迫，驻防内人口增加，物价上涨，驻防财政日陷困境，旗人生活艰辛。清政府为了解决驻防经济困难和旗人生计问题，调整驻防组织人员，设立教养兵制度，减少马甲人数，增加副甲和养育兵额，允许汉军出旗，或转入绿营，紧缩开支，扩大闲散旗人就业数量。经济上“广开财路”，各驻防把政府分发的“生息银”用于商人贷息银，从中牟利。如雍正七年，广州驻防从布政司得银14500两，按月息2.5%贷给盐商取利。福州驻防用这笔款开设当铺生财。乾隆时期，将“生息银”作为驻防固定存款的一部分，不再用于投资。到了咸丰年间，借贷商人银两吃利息之风再起，数量增加。还有驻防地把公共建筑房屋、土地、牧场等租给汉人，取收租金。广州驻防甚至连鱼塘、厕所和荒地都租赁给一般汉人。荆州、杭州驻防将草场、牧场分等租让农民佃耕，开垦成农田。作者用扎实的史料勾画八旗驻防财政的概貌，并从经济上的变化揭示驻防制度必然衰败的原因，所论中肯，言之成理。

2、结合清代社会矛盾，考察驻防制度变化，探讨清朝灭亡的因由。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兴衰史》一书始终把握着将驻防制度的演变纳入到清代社会各种矛盾中加以考察，指出八旗驻防的衰落是清朝统治腐败的必然结果。

清朝入关后，一再宣称“满汉一家，中外一体”，但又坚持“首崇满洲”。在八旗驻防地，为了避免满汉纠葛，旗兵及家属营地筑起围墙，形成了“满城”。将军衙门的总部自然在“满城”内。地方封疆大吏为与将军搞好关系，以示精诚合作，纷纷将他们的衙署搬迁到“满城”内。如浙江巡抚的官邸位于杭州“满城”。两广总督将官邸搬至广州的“老城”（即满城），广东布政使衙门、广州知府衙门，及至知县衙门，都设在“老城”。广东巡抚衙署与将军衙门隔街相望。福州等地也不例外。这反映了清初官僚集团内尽管满汉矛盾很大，多数汉官仍尊崇和维护满洲

贵族的利益，这种心态在汉官中持续了很长时期。

在驻防内，满洲与汉军也是不平等的。满洲旗人享有各种特权，得到许多实惠。而汉军旗人则受到歧视，后期生活得不到保障。如同治年间在上海、广州设立同文馆，被招十几名满洲、汉军学生入馆肄业。因两广总督瑞麟之疏奏，则改收满洲旗籍生徒。可见民族的不平等不仅限于满汉之间，八旗内的满洲、蒙古、汉军之间的矛盾也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加入满洲八旗的蒙古人、汉族人可以继续在满洲八旗中生活、服役。与后来单独分编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是有区别的。前者即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满洲旗分内的蒙古姓和汉姓。

在清前期满汉冲突中，作者也注意到民族关系的微妙变化。北方绿营兵南下平定三藩叛乱时，在广州大肆杀掠，民愤很大。当这支绿营兵发动，由京师调汉军八旗赴粤镇压。广州“居民中引起的反抗要远远小于老百姓对他们所征服和取代的绿营的反抗。”这说明清初民族矛盾是错综复杂的。

就满洲八旗内部而言，上自将军，下至旗人，也是等级分明，贫富悬殊。满城内最好的住宅是官府。如广州将军衙门“前面有高大的大理石影壁，其上雕有巨龙，大门外有石狮守卫。巨龙、石狮雕工惟妙惟肖”。“将军府后院有一小型鹿苑，三十多头小鹿十分可爱”。而“旗兵的房屋简陋得很，只有两个房间，外加一个建于旁边或后面的厨房”。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贫富分化十分明显。驻防满洲旗人的腐化还表现在任人为亲，滥用委员，纪律松弛，军事训练不能正常进行，致使不少旗兵不务正业，“穿着上等丝绸衫，终日醉醺醺，有的闲邇，赏花玩鸟”。这仍是广州驻防见闻。窥一斑可知全豹。驻防经费短缺，将军竟采用减少军事训练次数和削减军事装备的办法，节省开销，结果债台高筑，崩溃之势已成。

上述一些新颖的观点亦给人们启迪。

3、广引中外文献，史料详实丰富。《兴衰史》的史料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大类（不含日本等国学者论著）。作者经过多年史海披沙，广集分散的史实，有的史料颇有价值，使书增色不少。

中文文献有以下几类：（1）驻防志。如乾隆年间新柱等编撰《福州驻防志》，光绪时期希元等撰修《荆州驻防八旗志》、钟瑞等编写《京口八旗志》、长善等撰《驻粤八旗志》、张大昌修《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及民国时编的《绥远城驻防志》等，这些驻防志刊载了皇帝地敕谕、官员奏疏、营防建制、行政与财政系统的运行机制等。这是该书的基本史料。尤其是据抄本翻印数量很少的《绥远城驻防志》，记载了乾隆二年至民国六年驻防史事，颇为宝贵。（2）官修典籍。如《清实录》（前期历朝为主）、《大清会典》及《事例》、《八旗通志》、《钦定八旗则例》、《上谕八旗》、《钦定中枢政考》等等。（3）档案与方志。如《满文老档》、户部编《恩旨豁免陪项册》、《荆州驻防噶官塞署案牍》、《古北口驻防厢红旗满洲编审官兵等比丁三代清册》、《清末各地筹防驻军报销清册》等，方志如《杭州府志》、《荆州府志》、《广州城坊志》等。作者还搜集了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的清朝驻屯军编的《北京志》的史料，也很珍贵。（4）文集和笔记。如金德纯《旗军志》、福格《听雨丛谈》、王庆云《石渠余记》、景善《景善日记》等。上述三类文献弥补了驻防志记述的缺漏，为全面研究驻防制度提供史料。

英文文献主要引用了清朝中期来华的英国人等目击录。如道光二十二年，英人格·特拉德斯肯特·莱伊（G·Tradescant Lay）较详细地记载了乍浦水师驻防营房的情况。同治十二年，英国领事馆一个名叫恩·彼·戴尼斯（N·B·Dennys）的描述广州“鞑靼营”（满营）状况。又如托马斯·泰勒·迈德斯（Thomas Taylor Meadows）曾在十九世纪中叶，考察了广州、乍浦、江宁和镇江驻防，撰成《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London 1856）等。这批珍贵的

外文资料既可充实官书记载不足，又能验证官书记述的史实。

兹见《兴衰史》史实扎实丰富，言之有据，所论精当。

作为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兴衰史》是开创性的。掩卷所思，又感还应充实些什么？即如何将微观和宏观的研究联系起来。如五个驻防点剖析得较透彻，点面结合略显不够。八旗驻防始于关外，历时近 300 年，大体分成几个历史阶段，每时期有何特点，作出概述，再深入具体驻防点，这样作为一种制度的始末就更清楚了。总之，《兴衰史》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著作，反映了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它的出版对清史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任桂淳教授《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韩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在本篇书评草成之时，适逢中韩建交一周年之际，在此祝愿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园地能够开出更多绚丽的花朵！